

在計劃生育實施了近半個世紀後，中國終於徹底改變了生育政策。從限制生育卻有人依然不計代價的「超生」，到鼓勵生育但大多數人失去了生育意願，中間恰好經歷了四十餘年。因此這一輪生育政策的大轉向，其效果像極了貨幣政策中的「推繩子效應」：當限制信貸的時候，市場反應出的效果很明顯；但當鼓勵寬鬆的時候，市場卻不一定有信用和貨幣擴張的意願。繩子只能拉，沒法推。

# 放開生育政策的悖論(上)



▲中國經濟不可抑制的騰飛了！可以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一切的根源在於人。

澤被萬物  
趙建  
西澤研究院院長

人口生育市場也是一樣。當限制人口生育的時候，會有明顯的效果，但是當鼓勵人口生育的時候，人們已經

類似「借貨」一樣「借育」。因為時過境遷，與工業化前的中國處於農業社會，「人們的生育人數總會超過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相比，後工業化時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機會成本，讓剛剛崛起的中國中產階層望而卻步。這或許是另一種「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陷阱解釋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所處的漫長增長停滯狀態。由於低下的生產能力無法滿足快速爆炸人口，從而產生減少人口的各種形式，比如饑荒、瘟疫、戰爭，以及內在演化出的限制人口的風俗與政策。

今天中國雖然成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級)，生產力和供給能力已經高度發達(產能過剩)，但似乎出現馬爾薩斯描述的自動衰退的生育意願。但與農業時代或前工業時代相比，在消費型社會人的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人口增長率意味着經濟活力，人口塌方意味着經濟增長塌方。那麼，新時代的馬爾薩斯陷阱，可能也意味着中國多少年來一直想跨越的一種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龐大的基礎設施與14億人口形成了規模經濟效應或槓桿效應，如果人口一旦塌方，反向的衝擊也將是槓桿化塌縮的。如果中國不能重新開啟人口生育的第二增長曲線，那麼很可能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雖然生育後撫養比大幅提高，可能會降低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但可以解決中國經濟內在活力的根本長期問題。

## 一、工業化之前生存壓力：人口過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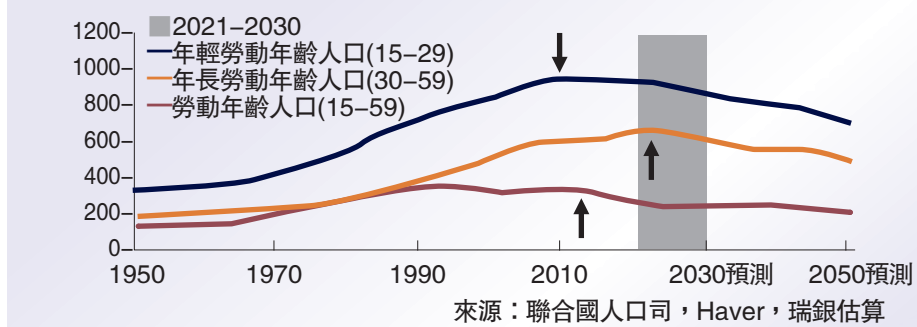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與之前相比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尤其是在社會保障方面，迅速建立起了涵蓋全國城鄉的醫療保健體系，特別是農村合作化醫療體系的建立，使中國農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國家醫療衛生保障。短短幾十年間，中國就根除了血吸蟲病，控制了肝病和肺結核病，基本杜絕了麻疹和天花，母嬰死亡率大大降低。物質生活得到保障的中國人民和戰後其他國家民族一樣也進入了生育高峰期，中國人口迅速的增加。

至1980年，短短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的人口已經快速從6億增加到了10億，同時人均壽命也從35歲提高到68歲。按照生育繁殖指數級曲線的規律，如果不加控制，還會進一步的爆炸式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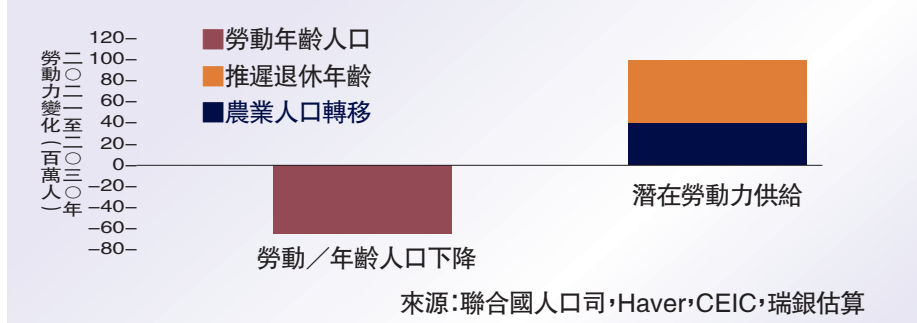
雖然很多人現在詬病和批評過去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但如果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也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為當時的中國尚未真正進入工業化時代，並仍然錯誤的實施計劃經濟，整個國家生活資料的供給有限。如果放任人口生育，很可能在人口大爆炸的失控形式下造成巨大的生存危機。馬寅初的人口理論一直在警示這一點。

此外，理解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還

## 勞動人口未來將進一步下滑



## 非農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



需要注意到以下兩點：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由於計劃經濟沒有真正的「引爆」工業化進程，實際上大部分時間中國還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們的生育決策還處於農業社會盡可能多生育以創造簡單勞動力數量的狀態。確切地說是一種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無後為大。與當時西方國家已經步入工業社會相比，中國特殊的落後農業社會狀態，需要政府在生育問題上進行干預。

其次，新中國成立後，醫療和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大幅提高了人均壽命（1949年為35歲，1981年為68歲，幾乎提高了一倍），但是潛在的生育意願還是按照過去較低的人均壽命，勢必會造成較大的人口壓力。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一個社會的生育增長率是歷史形成的潛在增長率，取決於千年演進過程中的一系列變量，比如人口存活率、人均壽命等。由於新中國成立後人均壽命的提高是一個突發的外生變量，但潛在的生育率卻是在漫長的中國農業文明中形成的，這種突然提高的人均壽命加上多生育導向的歷史潛在趨勢，勢必會造成內生失靈的人口過剩問題。

由此可見，當時計劃生育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時代合理性，是在各種外部因素大幅改變的情況下（人均壽命提高、供給不足、工業化初期等），對失靈的生育市場的一次干預。但當時的合理性並不意味著現在依然合理，這樣事關國運的大政策，需要根據中國新的發展階段，新的形勢及時做出調整，否則將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就當前的情況來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的確是嚴重滯後了。

## 二、工業化之後的計劃生育：人口紅利

計劃生育這一外生手段造成了撫養比的降低，創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而工業

化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提高，又進一步為人口紅利的變現創造了條件。這個雙向正反饋過程帶來了快速增長的「中國奇跡」，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就像一個家庭，老人還未老去，小孩又限制出生，剩下都是60年代嬰兒潮形成的青壯年，都是可以勞動賺錢又不用撫養和領養老金的當打之年，經濟焉能有不增長之理。但這個人口紅利，本質上是結構紅利，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到來，紅利會變成負債。關於這一點，政策層在制定人口政策的時候，早就應該認識到。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或者中國工業化進程被引爆的過程中，適度的人口控制起到了較大作用。如果不進行計劃干預，按照農業社會生育率進行的人口繁殖，很可能將中國經濟鎖定在增長停滯的「馬爾薩斯陷阱」。在大量人口增加帶來的生存壓力下，人們很難提供有效的生產剩餘和積累為開啟工業化進程提供資本。計劃生育將大量的農村人口從撫養眾多孩子的負擔中解放出來，進入鄉鎮企業、進入工廠、進入城市，推動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上述情況可以與同樣是人口生育眾多，但沒有進行計劃生育的印度比較。印度遲遲沒有真正的開啟工業化，原因有很多，但是人口數量增長過快、數量過度、人口素質不高，被鎖定在馬爾薩斯陷阱，可能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從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視角來看，計劃生育打破了農業社會下的傳統思想束縛，將中國人從傳統的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無後為大的封建思想束縛中跳出來，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完成自身價值的覺醒，投身到商品經濟和工業經濟之中，為自身及家庭更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去奮鬥，而不是陷入「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經濟思維困局中。這是從個人微觀角度，因為生育負擔減少而形成的要素活力。

同時子女數量減少可以更好提高教

# 中國土地收入改革利大於弊

視點超群



李超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6月初財政部發布財綜〔2021〕19號，決定將國有土地使

用權出讓收入、礦產資源專項收入、海域使用金、無居民海島使用金四項政府非稅收入統一劃轉稅務部門徵收。本次政府稅收徵管職責劃轉是預期內的、符合前期計劃的政策調整，是落實18年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政策思路的一個延續，並非空穴來風。

2018年2月，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該《方案》做出由稅務部門「承擔所轄區域內各項稅收、非稅收入徵管等職責」的部署。隨後在2018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其中明確提出分步實施改革方案的路徑：先合併國稅地稅機構，再接收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入徵管職責。未來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則，合理確定非稅收入徵管職責劃轉到稅務部門的範圍，對依法保留、適宜劃轉的非稅收入項目成熟一批劃轉一批，逐步推進。四項政府非稅收入徵管職責的劃轉由此而來。

## 提高效率降成本

本次劃轉徵管職責是計劃性的政策落實，有助於提升徵管效率和反腐敗，劃轉後仍歸屬於地方政府，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和推進房地產稅落地是未來關注重點。

四項政府非稅收入統一劃轉到稅務部門徵收，市場熱度較高，非稅收入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在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均有體現，其中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等是政府性基金和地產財權的主要構成，而稅收收入僅在一般公共預算中，對中央及地方財力均有重要補充。因此非稅收入徵稅職責的劃轉，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業界對於中央地方財權分配的關切，是故認為本次劃轉僅僅是出於便民、高效的

原則的制度調整，目的在提高徵管效率和降低徵管成本，劃轉後國有土地出讓收入仍屬地方，不能過度解讀為中央擴充財權範圍。

## 加強徵管反腐敗

本次劃轉徵稅職責有利於加強徵管和反腐敗。一方面，《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明確強調，建構統一的稅收徵收體系有助於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參照社保劃轉的實踐經驗，稅費統一徵收提升了繳費企業的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擴大了社會保險參保率，確實帶來了行政效率的提升和徵繳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稅收徵管部門的徵收力度大，尋租空間較小，有助於反腐敗。

## 優化財政資源統籌

政府性基金是我國獨有的財政第二本賬，土地出讓收入作為主要構成決定了土地財政高度影響地方財政，本次劃轉徵稅職責是否預示着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的合併？不確定性較大，但預算改革方向較為清晰。4月《進一步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提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要求不斷完善預算管理制度，不論是否合併，預算管理的核心目標在於加強財政資源統籌和可持續性。

中國財政對房地產的依賴性較強，典型表現是土地財政，土地批租制度下（指將若干年內的土地使用權一次出讓給土地使用單位），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力來源，是地方政府針對土地價值轉換為房地產價值獲得的收入，表現為增量概念，由此帶來了地方政府財力與房地產利益過度捆綁。堅持房住不炒、推進長效機制的政策背景下，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思路將逐步從增量轉向存量。

未來，隨着房地產稅的推進和落地，作為重要的地方稅種，保有環節房地產稅針對存量徵收，與土地脫鉤，有助國家調控房地產減少與地方政府博弈。但由於房地產稅的稅收規模與國有土地出讓收入有較大差距，預計這一進程將是較為漫長的過程。

# 自僱申請按揭 準備要充足

談樓說按



王美鳳

中原按揭經紀

董事總經理

自僱人士可以是獨資經營或合夥業務的合夥人，例如店舖或網店東主、非受僱之化妝

師、補習老師、鋼琴老師等，又或一些自僱的專業人士如醫生、會計師、律師等。

自僱人士若申請按揭貸款，所需提交的入息證明與受僱人士不同，由於自僱人士是自己經營業務，收入並非固定，做生意亦涉及成本支出，銀行需確保自僱人士的入息或盈利能足夠及持續地可應付按揭供款。一般來說，在入息證明方面，自僱人士需向銀行提交商業登記證、最近一至兩個課稅年度的稅單、公司財務報表、最近六個月顯示入息及現金流紀錄之銀行月結單等；如屬於專業人士則需出示執業證書或相關商業執照或證明。

按照現時樓按措施，借款人之入息水平一般需通過供款壓力測試，那麼銀行如何計算自僱人士的入息水平？銀行之間的審批方式不盡相同，

對於不同類別或行業的自僱人士，評估方式亦有分別。若以一位獨資經營的小店東主來說，他能出示公司稅單，銀行一般會以年度盈利計算其每月平均收入，有些銀行為了提高風險管理，會要求以兩年稅單計算平均收入，又或將兩年之間的年均收入作比較，取低者計算。

很多時，自僱人士又或合夥人經營業務一段時間後，亦會按月出糧給自己，又或夾份做生意的會按月支薪。有些銀行亦可將此類薪金計作入息，但大前提是，有關公司在支出薪金及日常成本後，仍是有盈利，而非蝕住出糧。

自僱人士亦可申請高成數按揭保險計劃，由於並非固定收薪，按揭成數最高達八成而非九成。但實際上，按揭公司對於自僱人士的審批是較為嚴格的。自僱人士若果準備置業申請按揭，應及早做好準備以便能出示充分證明文件予銀行。若果是剛創業人士，又或店舖東主報稅時申報該年沒有盈利，又或小型商販以現金收取客人款項，卻沒有定期存入銀行作紀錄，都令銀行無從評估借款人的還款能力，申請按揭確實會有較大難度。

育質量，大量的農村子弟通過高考進入城市裏面大學，從整體上提高中國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術素養。提高勞動力人均素養和質量，而非簡單的勞動力數量，是衝出馬爾薩斯陷阱的必要條件之一。

因此，需要站在特定的時代——農業社會大轉型或工業化浪潮的前夕，去理解作為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60年代嬰兒潮提供的充足的勞動力，加上人口生育限制降低的撫養比，再疊加市場化、工業化浪潮，中國經濟不可抑制的

騰飛了。可以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一切的根源在於人。因為改革開放也是來自每個人意識的覺醒、思想的解放。

這裏想重新定義一下人口紅利：不僅是年輕人口數量佔主導，更重要的是煥然一新的人——從計劃經濟束縛中走出來、完成市場啟蒙和價值覺醒的人。假如人們依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再多的人都沒用，都不是紅利而是負債。

(待續)